

何谓中国：藏学家柔克义的探索^{*}

陈波

内容摘要：柔克义既曾是美国政府的外交官，又是学者，研究过西方所谓的汉学和藏学，对学界产生过重大影响。尽管后世中外学界在不同的时代对他的多重身份有不同的解读，但到目前为止，所有对柔克义的研究都没能把握他整个学术研究的内在理路。本文认为，柔克义秉承的是法国藏学传统；由于个人对西藏的学术兴趣、独特的学术经历和时代的影响，他的学术研究大致出现过三种主题，以两次转向相联结：第一次是从早期南亚佛教史转向藏文明本身，第二次是从藏文明转向中国作为整体关系体系的思考，涉及朝贡体系、帝制中国、礼仪之邦和拓展海洋贸易的商邦，这四个维度相互交错。他将“中国”置于多维度关系之中，突破正在形成中的、基于民族—国家范式的学科分野，将汉学和藏学跨越性地联系起来，与当时乃至后世西方的主流藏学和汉学研究形成鲜明的对比。

柔克义 (W.W. Rockhill) 1854 年生于纽约，1914 年 12 月 8 日在前往中国担任中华民国政府顾问的途中于檀香山染风寒去世。现今西方学界把他视作美国藏学研究的第一

^{*} 本文的研究和写作，得到教育部 2012 年规划基金项目“西方藏学人类学研究”（12YJA850002）的资助。感谢匿名评审人对进一步修改拙文提出的宝贵意见。

人。他曾用欧洲主权概念去研究清朝与西藏¹的关系,提出中华帝国²对西藏拥有主权这一观点,对美国的对华一涉藏政策产生奠基性的影响³;1899年他曾与贺璧理(Alfred E. Hippisley)共同草拟“门户开放”政策⁴;1905年至1908年担任美国驻华大使。

遗憾的是,中国对他的了解有限;自一开始,中国学者对柔克义的看法,就因不同的时代思潮,在有贡献的学者与代表美国利益的外交官这二重身份之间裂分和左右摇摆。柔克义去世后最早评论他的是袁世凯,他称柔克义为“我亲密的朋友”⁵;1915年1月《中国留学生月报》上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对柔克义1901年斡旋列强处理义和团事件、保存中国版图和政权完整的外交能力大加褒扬⁶。1936年朱杰勤翻译过他的《欧洲使节来华考》⁷,并承认“其研究南洋史地,在某方面实胜吾人”⁸。1950年代中期以后对其身份的二重裂分性看法分入史一地和政治—外交两个领域,更为明显:在凡是引用柔克义学术著述、有关史一地的文作中,他有着未加置疑的权威乃至威望,但学者们对柔克义为何探索这些议题并未加以追问;在凡是涉及政治、外交事件尤其是涉及门户开放政策、辛丑条约(含庚子赔款)、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和涉藏事件等议题中,柔克义是美帝国主义的代名词,是负面的,如1959年丁名楠和张振鹄说:“美帝国主义对西藏早有野心,曾任驻华使馆一等秘书、后来充当驻华公使的柔克义于一八八九年间曾化装喇嘛,秘密入

1 英文为 Tibet。如何翻译这个词,颇为棘手。它跟藏文中的地理分类范畴和汉文中的地理分类范畴都不吻合,无法对译。本文根据它出现的语境,译为“西藏”“藏区”等,并在必要时括注原文。关于这个概念的政治意涵,下文有分析。

2 “中华帝国”是中文对英文 Chinese Empire 和 The Empire of China 的翻译。英文的概念早在16世纪中期就出现在欧洲学界,但要到18世纪以后欧洲学界才关注到它包含西藏(Tibet)这一事实。关于中译“中华帝国”概念在19世纪的形成过程,参欧立德:《传统中国是一个帝国吗?》,《读书》,2014(1):29-40;另外,中国学者对这个概念的历史的梳理,见曹新宇、黄兴涛:《欧洲称中国为“帝国”的早期历史考察》,《史学月刊》2015(5):52-63;Chen Bo, "Conceptions of 'China' in Early Modern Europe", *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 No. 48(4), 2015: 401-422.

3 参胡岩:《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中美关系中的西藏问题》,《民族研究》2001(1):52-62;胡岩:《美国政府与清末民初的“西藏问题”》,《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6(2):7-14。近来李晔对美国双重承认政策的分析值得关注,见李晔:《20世纪初期美国对中国西藏地位的“双重承认”政策》,《东北师大学报》2007(2):13-19。

4 Kenneth Wimmel, *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 Scholar-diplomat of the Tibetan highlands*, Bangkok: Orchid Press, 2003: 86-106.

5 袁世凯唁电,1914年12月9日;Rockhill papers, Box 2964-66, Yuan Shih-kai, Houghton Library, Cambridge, MA.

6 "The Death of Ambassador 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 *The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 Vol.1, No.4, 1915: 194-195.

7 W.W. Rockhill, 《欧洲使节来华考》,朱杰勤译,《史学专刊》1936(1):161-182。

8 朱杰勤:《纪念冯承钧先生》,收氏著《朱杰勤文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228。原载《南洋学报》4(1),1947年9月。

藏‘调查’。”⁹二重裂分性看法一直延续下来；近来由于政治的原因，国内学者对他的关注比过去稍多¹⁰，对他在史地方面的权威基本上没有变化，而对他在中美关系上的地位则推进到较为深入的层次。

二重裂分之见在西方学术脉络中有他种演绎。1915年，柯迪尔（Henri Cordier）、贺璧理和劳费尔（Berthold Laufer）都发表过纪念柔克义的文章，其中以贺璧理对他的评价较为典型。他突出柔克义作为外交官和作为学者的双重身份；作为学者，他又扮演着藏学研究者和汉文典籍翻译者的二元角色¹¹。最早对他进行专题研究的是时为哈佛大学本科生的闵金（George Minkin），他于1941年撰成毕业论文《柔克义传》，初步勾勒了柔克义的一生，并对其学术成就作出判断。他对柔克义的角色剖分，在贺璧理的基础上稍微做了一点关键性的修正：强调柔克义的学者角色，并明确他是汉学家（Sinologist），研究西藏（Tibet）¹²。1952年瓦格（Paul A. Varg）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出版《门户开放政策外交家柔克义》；跟贺璧理和闵金都不同的是，他试图从外交官的角度来总括柔克义的一生，但也承认其学者身份，在最后一章以“首先是一名学者”来综述他的学术贡献。他说：“尽管柔克义去世之后很久，[美国]外交官一向是由富裕阶层的男子来充当的，而这到1950年代时在整体上都没有改变，柔克义却是第一个对一个外国及其语言、历史、民族志和文化进行漫长而集中研究的一流外交官。”¹³也正是他指出，美国民俗学派创始人萨姆纳的“社会相对主义”是受到柔克义对蒙藏地区风俗的记载之影响而提出的。2003年韦慕义（Kenneth Wimmel）的《柔克义，高地藏区的学者—外交官》出版。这是到目前为止最好的一部柔克义传记，长于将人物放在大的社会背景之中来分析，短处则是对其学术涉及不够。韦慕义在美国国务院的工作跟柔克义彼时的工作性质相似：或许这是他撰写柔克义传的重要原因；他整合贺璧理、闵金和瓦格关于柔克义学者—外

9 丁名楠、张振鹏：《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领土西藏的罪恶历史》，《历史研究》1959（5）：14。冷战期间美国政府确实曾染指西藏，支持叛乱活动，但这里的关键是柔克义的游历与美帝国主义的利益是否前后相联且密不可分。须知，他的两次藏区游历是在被迫辞去驻华使馆公职之后进行的。此外，1889年他没能进入西藏；1892年那次他终于进入今日西藏的那曲地区，但也并非“秘密”，因为他手中持有大清朝廷开具的旅行护照，见 W. W. Rockhill, *Diary of a journey through Mongolia and Tibet in 1891 and 1892*. Washington: 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1894: 236.

10 有关联的研究，见张永攀：《从柔克义会谈到西藏商务代表团赴美——论美国对我国西藏地方的早期联系》，《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2000（1）：63-69；郭永虎：《柔克义与近代美国的西藏政策》，《中国藏学》2006（4）：60-66；程龙：《柔克义与中国》，《读书》2013（6）：122-127。

11 E. Hippius, "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1915: 367-374.

12 George Minkin, *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 Thesis, Harvard University, 1941: 4, 85.

13 Paul A. Varg, *Open Door Diplomat*,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52: 125.

交官二重身份和学术研究的侧重之遗产，突出柔克义在藏学研究上的贡献，颠倒闵金和瓦格所作的区分，在一定意义上回到贺璧理的视角¹⁴。

不过，“美国藏学研究第一人”与“门户开放”政策起草人的光环和美国外交官的身份等政治—外交因素遮蔽了柔克义一生的学术研究；到目前为止，中外所有的研究都忽略藏汉文明研究在他的视中国为关系体系的研究之总体中的意义；对他在那个时代所作的最重要的学术思考没有提出突破性的理解。最后，鉴于中外学界对他的学术研究缺乏通盘理解，本文拟从柔克义的原初学术兴趣在不同时代的影响中展开这一内在学术脉络去解读柔克义一生的学术贡献¹⁵。

柔克义学术人生的早期

柔克义的写作带着强烈的欧洲风格，经常在英文著作中大段大段地引用非英文的欧洲文献，有时甚至不作任何翻译；他所使用的英文句式常常过长，不是当时美国通行的那种。这种风格在后世美国藏学家那里完全见不到；他的学术根本不是美国传统，尽管他不断受到美国立场的影响。这是他的成长经历决定的。

柔克义是遗腹子，9岁前在美国纽约渡过。因为祖母和母亲之间的矛盾，他一直没能上学，直到他母亲毅然决定举家前往巴黎，才获得上学机会，以法文启蒙。1869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进入艺术和制造中央帝国学校。韦慕义认为，此时的巴黎正是波拿巴三世统治下的帝国首都，最具世界性特色的时期；大多数欧洲人视之为文明世界的中心；这里令人陶醉的、生机勃勃的气氛熏陶了柔克义。1872年1月他进入法国圣赛尔军校学习，期间读到古伯察的《1844-1846 鞑靼西藏旅行记》，产生强烈的兴趣，立志学习藏文并前往西藏。为搜集有关西藏的材料，他也着手学习汉文。他集中精力专注于某一题目的习惯从此开始。此后这一兴趣使柔克义专攻相关领域，逐渐奠定学术研究的基础，从职业军人转变成研究东方的学者，并在社会条件许可时，得以展开，取得不同的成就。1873年年底，柔克义毕业后前往北非阿尔及利亚服务于法国外籍军团，两年后辞去军职，回到纽约，操着法语式英语，穿着、行为举止皆不合美国风俗；次年结婚；1878年

14 近来的研究，亦参 Karl E. Meyer, "Close Encounters of an American Kind: 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 in Tibet", *World Policy Journal*, Vol. 15, No. 4. 1998/1999:73-90.

15 有极少文章本文无法涉及，譬如他在美国国务院工作期间写的 "Evils to be Remedied in Our Consular Service", *The Forum*, 1897(Feb.): 673-688; "The Bureau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s, Its Past and Future", *The Forum*, 1900 (Sept.): 21-27; "Notes on the Constitutions of the Republic of Colombia", *International Law*, II, 1904:1-10.

至 1881 年举家在新墨西哥州经营牧场，后迁往母亲再婚后的定居地瑞士。1884 年获得美国政府的任命，前往北京驻华使馆担任秘书（1884-1888 年）¹⁶。

无论是在阿尔及利亚从军的间隙，还是在新墨西哥州务牧的冬闲，他一直坚持学习；在瑞士期间更是集中精力研究藏文献。当时的法国藏学是富费里（P.-E. Foucaux）根据乔玛藏英字典和藏文语法而自创的，以藏文为新工具，在巴利文和梵文之外，另开印度佛教史研究的新途径；他们不能发音，对藏文明本身亦不感兴趣。因此，法国藏学的最初研究者是对佛教及印度佛教史感兴趣而学习藏文，而这一兴趣的背后隐约有着宗教动因，所以富费里的弟子仁安守才极力批判藏传佛教，谋求基督宗教进入藏区的路径¹⁷。这跟柔克义的原初兴趣无疑有着巨大的鸿沟：他只是对作为异域的西藏自身感兴趣而学习藏文，无关乎宗教。

柔克义在巴黎时跟富氏接触过，但在学识和藏文方面，影响他最深的是富氏最杰出的学生和接班人费立翁（Léon Feer）。1886 年，费氏根据当时欧洲的知识积累，写成一部以西藏（Tibet）本身为旨趣的风俗志¹⁸；而柔克义因写印度佛教史而附带涉及吐蕃和于阗历史的文字，则是在 1884 年：他利用藏汉文献，分析吐蕃历史记录的三个可能性开端即佛教进入吐蕃、热巴巾时期的藏文记录和汉文明的影响，然后介绍苯教历史，详叙吐蕃王系、唐蕃关系、吐蕃灭亡、佛教后弘期至米拉热巴时期的历史¹⁹。

可以肯定柔克义在来华之前，中规中矩地按照富氏的学术传统，运用藏文研究印度佛教和佛教史，并发表若干足以在学界扬名立万的文著；比如 1880 年发表的第一篇学术作品：从藏文本翻译的《四十二章经》²⁰；1883 年根据藏文《甘珠尔》，以英文译注并出版《法集要颂经》（Udānavarga）；随后译注藏文律经，于 1884 年在巴黎出版《佛传及佛教早期史：取自藏文甘珠尔和丹珠尔，兼及西藏和于阗早期史》，以及根据藏文典籍而造法译本《波罗提木叉经》（Prātimoksha sutra）²¹。这一段学术经历是柔克义对西藏本

16 Wimmel, *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 2003:3-11.

17 C. H. Desgodins, *La mission du Thibet de 1855 à 1870*, Verdun:C. Laurent, 1872.

18 FrerLeon, *Le Tibet*, Paris, 1886.

19 W. W.Rockhill, *The life of the Buddha and the early history of his order*, London: Trübner& co.,1884: 203-229.

20 W. W.Rockhill, "The Sutra in Forty-two Chapters, translated from the Tibeta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1 Proc. xlix-li, 1880: 49-51.

21 W. W.Rockhill trans., *Prātimoksha sutra; ou, Le traité d'émancipation selon la version tibétaine, avec notes et extraits du Dulva (Vinaya)*, Paris: E. Leroux, 1884. W. W. Rockhill, trans., *The life of the Buddha, and the early history of his order. Derived from Tibetan works in the Bkah-hgyur and Bstan-hgyur. Followed by notices on the early history of Tibet and Khoten*, London: Trübner& co., 1884. W. W. Rockhill, Trans. from Tibetan, "Le Traité D'Émancipation ou Pratimoksha Sutra", *Revue de l' Histoire des Religions*.IX. 1884: 1-2, 3-26, 167-201.

身的原初兴趣跟法国藏学传统结合的产物;1884年以后,柔克义完全抛弃这个藏学传统,再没有为之写过一个字,但其间的许多学术脉络却延续下来,影响后来的研究。

藏文明本身:柔克义学术的第一次转向

1880年代初他决定回归自己早先的兴趣:前往西藏。他知道要去西藏,先得去大清的首都北京,从那里领取护照前往。此外,他已经学习藏汉文十多年,但跟他在巴黎的老师们一样,无法用口语交流,在听说方面皆需要提高。

他在北京的藏语文老师,能查得出名字的有两位,对他影响特别深。他到北京后请到的第一位藏文老师来自距离西宁大约40公里的北川思阔寺[གཤེར་དཀོན²²(ཁོག་)དགོན་པ།汉语称郭芒寺],名叫丹增群培(བསྟན་འཛིན་ཚུལ་འཕེལ),当地人都叫他卜老爷(བྱ་ལྟ་ཡིའ)²³或卜喇嘛。丹增群培实际上并非出家人,而是思阔寺的施主,在西宁一带影响很大。1884年的冬天,柔克义跟他学习过三个月。五年后柔克义途经塔尔寺,为准备此后的旅途而造访他所在的寺院,得到热情的接待。柔克义曾把自己的经文译本赠送给他,卜喇嘛和思阔寺的喇嘛们因而称他为洛扎哇,即备受尊重的译师²⁴。他的第二个老师是洛桑丹巴(ལྷོ་བཟང་བསྟན་པ),来自于拉萨西郊的哲蚌寺。他受命于1883年至1889年间驻北京雍和宫。洛桑丹巴曾告诉柔克义,他曾用六个月时间替人念诵总计108部的《甘珠尔》,获得五十两银子的份缘。他取笑柔克义,说按照拉萨的标准,他会是非常英俊潇洒的人物,因为他们很推崇长有大鼻大耳的人,而柔克义的耳鼻非止大,而且是巨大²⁵。

在哈佛大学胡孚顿图书馆所藏柔克义文献中,有他学习藏语安多方言的笔记,其中一本没有封面。柔克义在笔记第一页注明发音来自一位极为聪明的喇嘛,驻雍和宫长达六年,但不懂得如何读写。笔记的内容主要是日常对话练习,如:“你来自哪里?”“你是谁?”“你叫什么名字?”“你住在哪里?”“你想要什么?”“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字?”“你来点茶吗?”敬语较少,基本上是以英文来标音,每一句的边上都用英文写出意思,间或标出藏文原词,对易混淆的标音加注如何读。笔记一共十二页,其中一页空白。另一本是有关西藏(Tibet)的英文笔记摘抄;笔记本上下颠倒后,在其反面有数页是藏文词汇,

22 原文如此。

23 感谢范德康教授于2013年4月17日在哈佛—燕京学社主持笔者的讲座时,指出这三个字来自汉文译音。

24 W. W. Rockhill, *The Land of the Lamas*, London: Longmans, 1891: 97-107.

25 W. W. Rockhill, "Tibet. A Geographical, Ethnographical, and Historical Sketch, Derived from Chinese Sources",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1891: 2; Rockhill, *The Land of the Lamas*, 1891: 104.

边上的拉丁文类似后来的转写，但有的带有读音的特征，不是一对一的转写；这表明柔克义已经在思考如何转写藏文，但方案不成熟²⁶。

这些笔记跟他前期研究藏文经典时留下的笔记形成鲜明的对照：后者大段地抄写藏文经文如《律经》，然后对其中的某个词汇如 ལཱ་ཁྱིཾ་པོ་ (地藏菩萨) 给出较长的法文注释，并注出梵文的对应词，或者对经文段落的翻译²⁷。没有读音，更没有对话。

文字在异文明研究中具有特殊的地位，人们经常用是否真正掌握某种文字来检验其研究是否有效。比如，富费里在藏语文方面因为是无师自通，所以他对藏文经典的翻译遭到法国东方学家毕贺诺夫 (E. Burnouf) 的强烈质疑；无奈之下，他找来儒莲从汉籍佛经翻译出来的文字对照，发现他的译本跟儒莲的译本是一致的，从而得以缓解质疑带来的压力²⁸。柔克义的藏文水平也曾遭到桑代伯格 (Graham Sandberg) 的质疑。桑氏说他在一个藏语词汇表中提供的发音是“极度幻想的”。桑氏能对自己未到之地的语言作出这样的判断，可见想象力十分丰富。柔氏辩解说，他连续七年从各阶层那里学习藏语，表上的发音是来自拉萨且受过教育的明正土司的秘书所授，当时还有毕天祥 (Biet Felix) 等精通藏语的欧洲传教士在场帮忙修正²⁹。

柔克义因与使馆大使长期有矛盾，到 1888 年夏在回乡探亲期间不得不辞职，但因此获得实现早年夙愿的机会：在随后四年中，他两度前往藏区游历和考察³⁰，并出版两部游记性的人类学作品：第一部即《喇嘛王国》³¹；第二部为《1891-1892 年蒙藏旅行日记》³²，这个名字跟古伯察著作初版时的名字几乎雷同，可见其对柔克义的影响之深；这也是他毕生愿望的实现。他的两次旅行路线构成一个巨大的 U 形：从北京出发，在上海结束，中间途经的核心范围即藏区。第一次经西安、兰州、西宁、柴达木盆地、玉树、康定、雅安，沿江而下至上海；第二次经内蒙古、兰州、西宁、柴达木盆地、那曲、类乌齐、

26 Rockhill papers, Box 98, folder 2 of 3, Notes on Tibetan language, Houghton Library, Cambridge, MA.

27 Rockhill papers, Box 106-110, folder 1 of 13, Vinayapitaka, Houghton Library, Cambridge, MA.

28 P.E.Foucaux, "Introduction", *Parabole de l'enfant égaré, formant le chapitre IV du Lotus de la bonne loi*, Paris: B. Duprat, 1854: 51.

29 W. W. Rockhill, "Review of Hand book of Colloquial Tibetan",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 Ireland (New Series)*, Volume 27, Issue 4, 1895: 918.

30 国内对他的旅行本身所作的初步介绍或研究，参胡岩：《早期进藏的美籍人》，《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6（2）：8-14；宗喀·漾正冈布、妥超群：《美国藏学家柔克义的两次安多考察》，《甘肃社会科学》2012（1）：109-112；妥超群：《汉藏交界地带的徘徊者》，兰州大学博士论文，2012。国内基于他的旅行著述而进行的诸多研究，因无关本文主旨，兹不一一赘述。

31 Rockhill, *The Land of the Lamas*, 1891.

32 Rockhill, *Diary of a journey through Mongolia and Tibet in 1891 and 1892*, 1894.

巴塘、康定、雅安，沿江而下至上海。柔克义详细地考察沿途的语言、风俗、历史、宗教信仰、清政府的统治、地方治理和族群关系等；他对人生的感悟也在这些旅途中激发出来，屡屡回想自己的文明、家乡和远方的亲人。韦慕义认为它们更多是对藏区的展示，而非个人经历³³，未必妥当。这些文字是柔克义原初兴趣促动的人生追求和在藏区各地旅行、观察相结合的产物，带着独特的学术眼光，与类似的旅行记录都不同；这使得《喇嘛王国》出版后不久即获得英国皇家地理学会颁发的金奖（1893年）。

此外，他根据汉文史料出版《藏区輿地风俗史志》（1891年），根据实地考察和所搜集的民俗藏品写成《藏区风俗学笔记》（1895年）。柔克义之前，英国驻华使馆医生布歇尔（S. W. Bushell, 1844-1908年）已经根据新旧《唐书》《宋史》《辽史》和拉萨的唐蕃会盟碑的内容，于1880年发表有关吐蕃史的文章³⁴。《藏区輿地风俗史志》所本的材料，除《唐书》外，主要是清代的，包括《明史》《西藏见闻录》和《西藏图考》等在内的13部典籍。

不言而喻，他的上述著作都是以藏文明本身为着眼点的，跟此前的法国藏学形成鲜明的对比，是柔克义原初兴趣的落实和开拓，也是对他的前一学术时期探讨吐蕃史这一脉络的继承。他在这些著述中逐步展现如何书写多语文区域民族志的思路，比如他者观、多元共存、跨领域沟通、辩证的能动性等，突破正在兴起中的、着眼于单一民族的民族志；萨姆纳也正是从他的思考中提炼出社会相对论；这些都为柔克义赢得了相当的学术声誉。这些思想对他后来思考中国有着直接的影响，正是在这些著作中，他已经开始将西藏纳入到东方关系体系中加以思考，比如在《藏区輿地风俗史志》开篇他就说“在如此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汉藏之间的关系是如此亲密”³⁵，而对这一关系体系的思考最终集中地体现在有关中国的著述中。

对中国的四个探索：柔克义的第二次学术转向

早在1870年代初学习汉语文时，这种转向就已经萌芽。1880年代初他即开始思考

³³ Wimmel, *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 2003:53.

³⁴ S. W. Bushell, "The Early History of Tibet. From Chinese Sources",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New Series, Vol. 12, No. 4, 1880: 435-541.

³⁵ W. W. Rockhill, "Tibet. A Geographical, Ethnographical, and Historical Sketch, Derived from Chinese Sources",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1891:1.

藏语和日语在结构和构词上的相似性,还探索过八思巴蒙古文³⁶。学术转向的现实动因是他所生活的时代向他提出的问题。他到中国后,视野顿时扩大,触及从未考虑过的问题,研究随之变。如1886年年底至1887年年初,他前往朝鲜担任美国驻朝鲜临时代办期间,大朝鲜国的大君主给美国一个照会,说5年前大美国和大朝鲜国之间立约属“平行相待”,明确答允将约内各款按照自主公例认真照办,但“大朝鲜国素为中国属邦,其一切分内应行各节均与大美国毫无干涉”³⁷。这让他对这种东方关系深感困惑:如何用西方的观念来理解这一关系³⁸?

他研究西藏数十载,游历藏区经年。游历中的所见所闻加上广泛的汉文阅读,与他曾读到的许多西方作品有出入,其中最为关键的议题是:西藏跟中国到底是何关系?美国政府其时涉世不深,在涉藏问题上迫切需要像柔克义这样的专家作顾问。他当然有明确的答案。

此外,中国皇帝接见西方来使的宫廷礼仪也使西方人深感困惑,而使节则备有压力:这就是磕头。西方使节在坚韧地与接待官员甚至皇帝讨价还价如何行使礼仪时,最头痛的是官员坚持要他们下跪。他要回答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最后,他是外交人员,要协助美国来华的商人,回答他们的咨询,为他们提出投资建议。门户开放政策提出后,1900年2月19日他应邀在波士顿商会发表主题讲演。他认为,在列强激烈竞争对华贸易并取得过去由英美两国实际垄断的市场时,需要门户开放政策来加强清廷而确保各国利益,否则各方俱损。他说:美国政府已经为各位商人铺好了经商之路³⁹。要进一步了解中国的对外贸易,就必须深入到漫长的历史中去。

柔克义所处的环境和时代向他提出的这些问题,归根结底是何谓中国。他的原初兴趣引领着柔克义来到这个问题面前,而这个根本性问题则使他的兴趣第三次拓展:他着手研究更广泛的领域和议题,走上第三段学术历程。他后半生(1884-1914)所作的解答可以归结为四个方面,即朝贡体系、中华帝国、礼仪之邦和拓展海洋贸易的商邦。

36 W. W. Rockhill, "Notes on certain analogous structures and constructions in Tibetan and Japanes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1 Proceedings (54), 1880: liv. "Two Mongolian inscriptions in the Pa-sse-pa character",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1 Proc. 1882:107.

37 Rockhill papers, Additional papers, box. 85a. Houghton Library, Cambridge, MA.

38 W. W. Rockhill, "Korea in Its Relations with Chin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13, 1889:1.

39 W. W. Rockhill, *The Open Door*, Boston Merchants Association, 1900.

1. 朝贡体系

柔克义眼中的中华朝贡体系，涉及朝鲜、西番、西藏和缅甸等地。柔克义曾着力于中朝关系⁴⁰，发表过两篇文章（1887/1889, 1891年）⁴¹，出版过一部专著《中朝关系史：15世纪到1895年》（1905年），并编过一部涉华和涉朝的条约集（1904年）⁴²。对以研究西藏为初衷的他来说，花如许工夫去钻研中朝关系，已经走得够远，但又恰当其时。他认为，中朝关系就是朝贡关系，但这一朝贡关系的特征和目的是经济利益：朝鲜朝贡给皇帝，皇帝得到经济上的好处；而朝鲜使团则借此机会沿途贸易，获取好处。这里的问题关键在于他用英语中的“Tribute”（贡品）和“Tributary”（朝贡者）。在欧洲历史上，它们一直跟“税收”联系在一起；征服者向被征服者收取的象征臣服的金钱，也叫“tribute”，根本不涉及朝贡者会从受贡者那里得到回赐的问题。为论证他的经济利益论，柔克义使用四条来自《明史》的材料，遗憾的是他全解释反了⁴³。

有时他又有点犹豫：这是一种平等的关系，没有臣服的意思，有点像一个家庭中年幼的成员跟家长之间的关系，比如朝鲜国王请求中国皇帝许可朝鲜储君、其妃子的名字，上报朝廷王室人员的死亡等，不过是礼仪性的关系，尊重家中长者罢了。明朝之于朝鲜，好比父亲，而清朝则好似长兄。朝鲜视中国，好比家中的家长。清朝皇帝在1882年时也说过，朝鲜是近亲⁴⁴。

有时他又使用宗主权（suzerainty），甚至主权（sovereign）和双重主权即朝鲜自己有主权，而中国对朝鲜也有主权，来理解双方的关系。他说：“中国和朝鲜在官方文件中一度使用过朝鲜是属国这个词。属国曾经翻译为英语 vassal kingdom, fief 等。但这些表述是误导人的，因为‘属’就带有关系的意思，这是理解朝鲜依附体系的关键词。”⁴⁵

他曾经感叹所得资料太少，无法全面揭示这么复杂的关系；关键是他说：“我无力也不想确定中朝关系：请读者去判断。因为这种关系最终不能用我们西方的规则去确定；由于已经出版的材料不足以解释这种亚洲式关系，所以对我来说它依旧是未知的。”⁴⁶

不过，有一点是明确的，柔克义的时代，几乎是中朝关系重塑的时代，尤其是1895

40 程龙也注意到柔克义在这方面的研究，见程龙：《三田渡碑的一段学术史》，《读书》2011（4）：120。

41 W. W. Rockhill, "Notes on Some of the Laws, Customs, and Superstitions of Korea",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Vol. 4, No. 2, 1891:177-188.

42 W. W. Rockhill, *Treaties and conventions with or concerning China and Korea*, Washington: Gov't Print Office, 1904.

43 W. W. Rockhill, *China's intercourse with Korea from the XVth century to 1895*, London: Luzac & Co., 1905: 8-9.

44 Rockhill, *China's intercourse with Korea from the XVth century to 1895*, 1905:4.

45 Rockhill, *China's intercourse with Korea from the XVth century to 1895*, 1905:3-4, 9.

46 Rockhill, "Korea in Its Relations with China", 1889:31.

年中日甲午海战以后,日本将朝鲜纳入其体系内,而中国皇帝不得不认可。他编辑条约集,就是希望这一关系的走向能有个条约框架。

2. 中华帝国

我们以他对西藏在中国的地位的理解,来说明他的中华帝国观。《1891-1892 蒙藏旅行日记》本来是一部游记性日志,可他在 324 页上记述昌都地区察雅宗的社会上层如喇嘛跟朝廷驻军的关系时却突然说:“若说中国在西藏没有主权,若说中国官员只是在当地管理自己的人,并因此见容于当地,那就荒谬不经了。自康熙或乾隆以来的历史,各种历史事件,以及近来的事件,在拉萨发生的,在印度边界发生的,都确定无疑地证明并非如此。但中国并不要用武力控制西藏,这不值得;相反,中国是通过外交,通过高超的涉外知识,以及通过跟喇嘛们搞好关系,来保持自己无可置疑的支配。”⁴⁷ 这个结论是他长期思考和研究的成果。他的游历使他看到藏区各土司、各种治理权力交织的现实,所以他从来没有把拉萨的噶厦看作是各藏区的代表。1910 年他关于 1644-1908 年间拉萨的历辈达赖喇嘛与中国满洲历代皇帝之间的关系,即表明这一点。该文上溯到元明时代,从八思巴担任元朝的“御师”、明朝封赐各种封号开始。这一关系史研究是他早年吐蕃史研究的延续。柔克义系统地使用汉文史料和实地调查材料,讲述清廷逐步确立对噶厦进行管理的历史和具体措施,尤其是达赖喇嘛觐见皇帝的宫廷礼仪非常严格;1908 年时十三世达赖喇嘛提出“自行具奏”皇帝而不用通过驻藏大臣,但没有成功⁴⁸。

在使用英文概念上,他的涉藏作品呈现出最为吊诡的一面,比如 1889 年 2 月 10 日,他在离开西宁前往塔尔寺时曾说:“就在我们即将看不到西宁的时候,我们好像突然间将 China 及其人民抛到身后。”⁴⁹ 三年后他途经康区时曾说:“这条江从巴塘到流入 China 的地方,称为金江。”这里的 "China" 不能理解为今日的“中国”,只能理解为内地,但当时在英文中它是跟 "Tibet" 平等对应的;有时二者形成复杂甚至难以理解的表述,比如他说:“雅江的河口是 China 的前沿驿站,明正土司所有地的最西陲,也是我们在 Tibet 所经过的最低点。”⁵⁰ 此外,这两个概念及其所指并不是固定的,而是有着动态的变

47 Rockhill, *Diary of a journey through Mongolia and Tibet in 1891 and 1892*, 1894: 324.

48 W. W. Rockhill, "The Dalai Lamas of Lhasa and Their Relations with the Manchu Emperors of China, 1644-1908", *Young Pao*, Vol. 11, No. 1, 1910:1-104, esp.86.

49 Rockhill, *The Land of the Lamas*, 1891:56.

50 Rockhill, *Diary of a journey through Mongolia and Tibet in 1891 and 1892*, 1894:209, 363-364.

动关系⁵¹。

有一点是确定的：能把它统一起来的概念是“中华帝国（the Empire of China / Chinese Empire）”：二者都属于中华帝国⁵²。1889年8月8日他离开曾跋涉数月的藏区，离康定经雅安买舟而下至宜昌时说：“我的舟旅结束。从此，读者对我在中华帝国所作诸段游历的兴趣也减弱。”1892年夏，经可可西里至黑河（那曲），为噶厦的涅尔巴（管家）所阻时他说：“我是用中华政府的护照在旅行，除了驻藏大臣，没有人能控制我的活动，我要到拉萨去和他讨论这个问题。这个威胁深深地震动他们。”他折途昌都到达类乌齐县时，昌都寺派来的宗本帕巴谢饶（本是四川汉人）阻止他进入昌都。柔克义跟他辩论说：“我现在的旅行之路在昌都或拉萨管辖之外。我是在中国皇帝的大路上旅行。”谢饶承认他说的没错。1889年他到达甘孜时正是藏历四月十五日萨噶达瓦节。他说：“与中国的其他绝大多数宗藩（dependencies）不同，藏区（Tibet）保有自己的计时系统。”⁵³

也正是中华帝国概念使我们可以理解他发表的中国1910年估计人口表：他把18省作为一类；满洲（含奉天、吉林和黑龙江三省）、突厥斯坦即新疆和四川/云南藏边各作为一类，皆分别列出其人口数并算出总数；然后列出6岁以下的婴儿、蒙古和西藏的人口数，后面打上问号⁵⁴，最后再算出总数。在他看来，中华帝国内部不是同质的，而是分为若干层类。

3. 礼仪之邦

1897年他发表《遣往中华宫廷的使团：磕头问题》（两部分，后于1905年合编、修订后作为单册《中华宫廷的觐见礼仪》出版）⁵⁵，集中地梳理东西方接触史上的宫廷礼仪议题，堪称柔克义最精华的文章之一，其翔实材料、细腻分析和长时段历史逻辑的考虑，都值得今日再读。何伟亚有关马嘎尔尼访华的《怀柔远人》中重点探讨双方交涉最核心的议题之一，即马嘎尔尼是否给乾隆皇帝下跪；经萨林斯的指导，何伟亚的探索具有文化结构并接的色彩，但局限于1793年双方交往的时间点⁵⁶。柔克义对中华宫廷礼

51 Rockhill, *The Land of the Lamas*, 1891:276-77.

52 国内已经有学者注意到这一点，见胡岩：《早期进藏的美國人》，2006：8。

53 Rockhill, *The Land of the Lamas*, 1891: 319, 227, 236, 241.

54 W. W. Rockhill, "The 1910 Census of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T'oung Pao*, Vol. 13, No. 1, 1912:124.

55 W. W. Rockhill, "Diplomatic Missions to the Court of China: The Kotow Question",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2, No. 3, 1897: 427-442; No. 4, 1897:627-643.

56 何伟亚：《怀柔远人》，邓长春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仪的分析，早已经超越一个时间点的分析，将历史的各种可能性展现得淋漓尽致：他发现古希腊使臣前往波斯宫廷，直到近代，都是从较弱的政权派向较强的政权，以求保护，寻求贸易好处，争取援助抗击敌人，或者是去主权者那里送礼。在漫长的历史时段中，有的使臣接受下跪磕头礼仪，有的拒绝，有的则与对方讨价还价，坚持自己认定的觐见礼仪。多样的互动彰显时代的特点、客方使臣和主方君臣的思想和能动性。文中他所指的中华（China）是一个极为广泛的东方概念，它包括蒙古人宰制时期的波斯宫廷，重点是唐以后中国诸朝的宫廷；他涉及的西方也是一个广泛的称呼，有时使唐的大食也算在内，不过重点还是西欧诸国。

根据刘贝利（La Loubère）⁵⁷ 的观点，东方君主的使节不过是主人的信使，不能代表主人；若使团中的大使病故，他们就从中选出一人担任大使，继续信使的任务。拿破仑一世也认为大使不代表君主，也绝不能跟君主平起平坐⁵⁸。问题是欧洲自康斯坦萨会议（1414-1418 年）后民族的观念兴起；在威斯特法利亚条约体系（1648 年）之后，民族—国家、主权等观念则相继而起。大使不但代表君主，而且代表国家和人民。双方即因这种观念不同而就宫廷觐见礼仪博弈。

他将整个考察的历史分为三段：西历纪元 1654 年之前，双方接触不多，但已经孕育宫廷觐见礼仪中的各种互动可能性；而礼仪也因朝代不同和君主的文化背景不同在觐见方式和过程上也有差异，比如蒙古宫廷的仪式就需要使节从火上跨过。1692-1857 年是清廷与俄罗斯签署尼布楚条约以后，双方在宫廷礼仪上密集互动的时期；1859-1901 年，因大清军事上的失败，以前强势的基础消失，在觐见礼仪上失去宰制权，西方取得主动权，开始指点清廷制定觐见礼仪⁵⁹，而清廷则通过在时间地点等方面做小的变动来彰显自己的主权性。

戏剧性的是，1901 年醇亲王专程前往德国就义和团事件致歉，德国皇帝要求使团下跪磕头，遭到大清朝野的断然拒绝，使团拒绝进入德境，理由是以前德国使臣到大清都拒绝磕头。双方几经交涉，德皇同意免去磕头礼仪，改为鞠躬，大清使臣才进入德国宫廷⁶⁰。这是他在 1905 年单行本中增加的，但正是这一节提供了一个结构倒置的视角，精彩地点出历次宫廷觐见礼仪博弈所带有的文化二元关系。

57 从朱杰勤译文，见氏译：《欧洲使节来华考》，《史学专刊》1936（1）：259。法文读如陆伯贺。

58 W. W. Rockhill, *Diplomatic audiences at the court of China*. London: Luzac & Co., 1905: 1-2.

59 柔克义自己也参与这个指点。见杜继东：《外国人觐见清帝的礼仪之争》，《历史教学》1990（7）：31。

60 Rockhill, *Diplomatic audiences at the court of China*, 1905: 1-3, 5, 48-54.

4. 拓展海洋贸易的商邦

早在 1888 年柔克义在大清各地旅行时，就已经注意到各地复杂的商贸关系，比如他发现陕西潼关是通往中国东部、西部和西北部的交通干道的枢纽，也是连接通往缅甸、印度、中国西藏和中亚地区交通路线的枢纽。他长于将一个小地方跟帝国广阔的区域联系起来理解，带着法国学术的影响，比如他把西安、西宁、玉树和打箭炉（今康定）都看作是更广泛区域的交通和贸易之枢纽⁶¹。

随着对贸易兴趣的增加，他将整个东西方贸易接触史纳入研究范围，从 1913 年起在《通报》上连续发表 8 篇文章，题名为《十四世纪中国与东方群岛及印度洋沿岸的关系与贸易》。他把中国的海外贸易拓展到秦朝以前：其时双方没有直接联系，只是通过中介比如印度和斯里兰卡等地进行贸易。秦征交趾以后，双方建立直接联系。西历纪元 166 年，大秦使节来到汉桓帝宫廷。四到六世纪，双方的商贸往来受制于中国的局势和海盗；七世纪以后，双方的贸易大为拓展，广州、泉州、福州等商贸港口出现。宋元时代，朝廷先后的统治者都采取措施招揽海外朝贡，而促进贸易，进而设立市舶司加以管理等。一些记载海外诸地的志书相继撰成并出版。柔克义晚年就是根据这些材料研究中国的海外贸易。他敏感地发现，朝廷进口两类货物，一类是普通货物，另一类是奢侈品，比如象牙、犀牛角、乌木、玛瑙、珊瑚，以及各种香料和香水。这两类货物，跟朝廷对海外贸易实行垄断及走私盛行似乎有密切的关系。国人的足迹通过海外贸易远达印度、阿拉伯和非洲等地⁶²。

柔克义研究笔记的最后一则是汪大渊《岛夷志略》中“罗婆斯”条的译文；最末一句若再以中文译出，则是：“其地酷热，故其民按照时空节律自然行事，无需关心蔽体之衣。难怪他们不择食物、居处，不关心贸易。这乃是太古之天堂矣。”⁶³在一篇讨论贸易的笔记中，以不关心贸易、生活“陶然自适”的岛民结束，多少体现了柔克义的精神向往。

61 Rockhill, *The Land of the Lamas*, 1891: 18-19, 23, 48, 206, 277-285.

62 W. W. Rockhill, "Notes on the Relations and Trade of China with the Eastern Archipelago and the Coast of the Indian Ocean during the Fourteenth Century: Part I", *T'oung Pao*, Vol. 15, No. 3, 1914: 419.

63 W. W. Rockhill, "Notes on the Relations and Trade of China with the Eastern Archipelago and the Coast of the Indian Ocean during the Fourteenth Century: Part V", *T'oung Pao*, Vol. 16, No. 5, 1915: 626.

结论

上述四个解释相互之间是交错的，如柔克义既把西藏（Tibet）视为中华帝国的一部分，也把西藏算做朝贡体系的一部分，更是跨区域远距离贸易的一环，在达赖喇嘛觐见皇帝的宫廷礼仪上也有一套例规。这就不能简单地把他的研究视作后世所说的藏学或汉学。他思考的其实是一种东方式的关系体系；在他之前或之后的西方汉学或藏学研究中，这一套关系体系要么遭到极大的忽视，要么被改造纳入民族—国家的范畴。柔克义将“中国”置于多维度关系之中，因而能突破正在形成中的、基于民族—国家范式的学科分野，将汉学和藏学跨越性地联系起来，与当时乃至后世西方的主流藏学和汉学研究形成鲜明的对比。

后世学者如乐英才（Owen Lattimore）、施坚雅，以及近来王斯福所演绎的“中国”都没有柔克义所诠释的那般恢弘、阔远而富有历史的弹性：乐英才提供的是一个帝国模型⁶⁴，仅仅是柔克义思考的一部分；施坚雅提供的几乎是一个农业民族—国家模型⁶⁵，其实是柔克义思考的与 Tibet 相对的、很有限的意义上的 China；王斯福则基于福柯式的权力控制路径，反思跨越历史的帝国—国家在中心跟边缘关系之中的议题，也基本上是帝国模型⁶⁶；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一定需要一个政体才能思考历史和中国。柔克义的工作似乎提醒我们，“中国”是朝贡、帝制、海洋贸易、宫廷礼仪等各种关系辐辏的体系并体现在这些关系之中，而不是西方政治学意义上的政体。

柔克义是一个整体的人，与他的时代须臾不可分；作为整体的人，他有持之以恒、内在一致的人生和学术追求；他生活在并非现代民族—国家的时代，他的学术表述与这一时代有紧密的关系。关系视角是我们看到他作为整体的人与其时代密切关系的途径，庶几克服本文一开始提及的中外学界关于柔克义作为学者和作为外交官身份的两种二元裂分表述，尤其是克服西方学界对他作为汉学家和作为藏学家身份的非此即彼的二元裂分表述，最大可能地呈现柔克义所思考和研究议题的整体性。尽管他的学术思考与著述跟他的外交活动之间的关系仍有待进一步推究，但本文可以说是到目前为止在整体的关系视角中最为全面地介绍柔克义学术成就的。

他去世后，据说他在任职朝鲜时结识的朋友、时任中华民国总统的袁世凯曾送去一

64 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65 施坚雅著，史建云、徐秀丽译，《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66 Stephan Feuchtwang, "Border regions and empty spaces", Chinese Religions Workshop, Harvard University, Feb.2, 2013.

颗华山松⁶⁷，以表中国对他的敬意⁶⁸；同样是在欧洲受学、涉足汉学和藏学研究的劳费尔曾不无感慨且苦涩地说，在柔克义辞世之际，他的政府对其外交工作的评价，远不如中国政府所作的评价高⁶⁹。2012年12月，笔者曾利用冬假的机会，随康涅狄克州一位旧友驱车前往礼祈菲县（Litchfield），发现柔克义墓在一个小山冈上，而这颗松树至今仍孤独地屹立在前。

◆ 陈波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副教授

67 蒙李星星研究员指出松树的类型，特致谢忱。

68 关于此松也有别的说法，见 Wimmel, *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 2003: xiv.

69 B.Laufer, "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 *T'oung Pao*, Vol. 16, No. 2, 1915: 290.